

□吴济夫

上海市卢湾区自忠路455号，曾有一座清代的“山东会馆”。其前身是会聚上海的山东客商购买的50余亩墓地，以备乡胞日后客亡之用。清咸丰年间因战乱疏于经管，遂被当地民户侵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此地时任知县、山东历城人汪懋琨收回产权，募银万余，请山东籍驻沪商约大臣吕镜宇主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营建了这所“山东会馆”。

中国东南部临海，长江在东海岸线之中入海，以长江口为界，当时以北的海面称“北洋”，以南的海面称“南洋”，上海在南洋与北洋的交界处。千万年来，黄河带着大量泥沙在北洋近海地面沉淀下来，形成大面积的滩涂，涨潮时被海水淹没，退潮时露出水面，只有称之为沙船和山东制造的平底浅船——卫船，才能在这里航行。南洋依托的陆地是浙江、福建的山地丘陵，近海多悬崖、岛礁。水深浪急，只有浙闽制造的深水船才能航行。上海则是南北两洋的交汇点，也是海上南北航运的枢纽处、中转站及贸易集散地。特殊的地理位置，突显了上海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吕海寰（1840—1927年），字镜宇，山东掖县人。清同治六年（1877年）举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任苏松太兵备道即上海道。次年，李鸿章专荐吕海寰以四品京堂候补，为驻德国、荷兰大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吕海寰回国，任工部尚书、驻沪商约大臣，督办津浦铁路，冲破重重阻力，解决了浦口站与泺口桥两大关键问题，使铁路顺利通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末，日俄战争爆发。吕海寰与同任商约大臣的工部左侍郎盛宣怀和驻沪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邀约上海官绅和各驻沪机构代表共同协商，于光绪三十年正月廿四（1904年3月10日）正式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吕海寰为创始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由中、英、美、德、法五国合办，救护日俄交战双方伤兵及东北战地难民46.7万余人，光绪帝曾“颁发内银十万两”做经费，以为褒奖。

吕海寰在历史上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驻上海期间写过《创修山东会馆碑记》：“余自光绪甲午（1894年），承乏镇道，丙申（1896年）权摄沪关，则常进吾乡之商于斯者，询以利弊。既稔知来者之多，与旅居之不易，每思辟地为馆，以生合群之力而联散涣之情。乃丁酉（1897年）冬，奉使以去，未能举行。迨辛丑（1901

年）腊月，自海外归来，奉命留沪，办理商约。当是时，历城汪瑶廷观察适宰上海，政成而事举，吏畏而民怀……汪君谋立会馆，众以为然。王瑞芝等君首创蠲金，扩基造大，绘图示余。迄今江西巡抚海丰吴公仲怿，以管电政驻节上海，闻之亦乐观厥成。于是建议兴修，公请徐星阶大令董其役。殷者效财，能者尽力，朴不伤陋，华不至侈。始光绪癸卯（1903年）四月，及丙午年（1906年）冬月迄工。”

《创修山东会馆碑记》中提到的汪懋琨，字瑶廷，山东历城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任上海知县。他撰有《新建山东会馆记》曰：“道光之季，粤匪东窜，咸丰庚申，苏郡失陷，上海婴城固守，发逆屡来窥伺，干戈扰攘，城西悉成战场，吾乡之商于斯、旅于斯者，皆避难航海而归，是地遂任其荒废，无复过问者。”

康熙开放海禁后，有相当数量的山东航运商又进入上海。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随之爆发小刀会起义；1860年太平军东进，上海处于动荡之中。山东商人离开上海，开展对朝鲜贸易，致使建立上海“山东会馆”搁置。中日甲午战争后，中朝贸易被迫中止，大量从事对朝鲜航运和贸易的山东商人被迫回国，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上海，形成“山东帮”，而有更多的商人成为上海“钱业”的翘楚。至此，“南市公估局、广记、六吉等号，将存项输助三千金，怡顺昌、正祥同、公和通三家先分垫万余金，乃于地之西、北两角，添购地六亩有奇”，创建山东会馆。

山东商人在上海从事的行业很多，有皮货、织丝、草编、南北货，但最主要的是报关行。据有关史料载，会馆历任董事长王瑞芝、王绍坡、赵聘三、崔景三均为报关行巨商，皆属山东胶东地区人。

1914年，山东会馆的地基被划进法租界，除了原来设在会馆里的“丙舍”迁出外，会馆照常开展工作。据史料载，“山东会馆”营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兴起房地产业，会馆东南两侧之地出租，丰裕里和巴黎新村遂于此处建成，又在西门路即今自忠路建两层楼房，一层由霍元甲的精武馆分租，二层设“齐鲁公学”。这些建筑至今大致尚存。

1919年五四运动，时任山东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议员尤开统专程至沪，于会馆内召开会议，以山东旅沪同乡会名义致电政府：青岛及附属各项路权，俱属我国领土主权，并强烈表示“不惟日本无占据之权，即五国亦岂有共管之理”。1919年5月5日晚，山东会馆与世界和平共进会、留日学生救国团等28个社团，议抵制日货。

上海“山东会馆”还曾是上世纪40年代初抗日联盟的秘密处所及营救抗日将士的中转之地。1942年，会馆的部分土地改造为齐鲁中小学，公开对社会招生。1953年，会馆由中国人民救济会上海分会接收，齐鲁中学则由教育局接管，1964年归卢湾区教师进修学院使用，后又改为卢湾区教育学院，如今山东会馆建筑主体荡然无存。

所幸有原山东会馆“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拍摄的一张老照片可以窥见：气派的“山东会馆”大门，是一处中西合璧的建筑。在门楼上带有“欧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的门楣中，书写着四个大字“山东会馆”。白底黑字、布局稳健、气度宽博，甚显齐鲁厚朴之风。据考，此为清末状元、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王寿彭的墨宝，其书法学养深厚。大门两侧，分别悬挂着“齐鲁小学”“齐鲁中学”两块牌子，在侧门的右方挂着“上海武训学校”，系董必武所题。齐鲁小学诞生于1925年，武训学校成立于1946年，是李士钊受陶行知所托而建。

往事烟云尽逝，历史当为重述。昔日辉煌的山东会馆早已无人知晓，唯有“山东会馆”大门之影像存照，彰显着齐鲁的荣光。

【故地往事】

□孙葆元

济南市区带“坛”字的地名，一个是“天地坛街”，另一个是“北坛”。天地坛不见了踪影，空留下一个街名；北坛也曾匿迹，近年得以修复，是个小型的圆丘，耸立在大明湖北路一侧，算是一个景观。

自古街以立坊，坛以祭祀，这是传统城市建立市井的基本要素。坊市是当下的生活，祭祀是对以往的传承，探索一座古城的历史密码，就看它留下的这些痕迹。

在传统文化中，祭祀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考察古代遗址，有坛、庙、祠，都是祭祀的场所。称谓不同代表着用途不同，“坛”是祭祀台，古有大事必设坛；“庙”是祭祀祖宗和神祇之所，祀人不祀事；“祠”的功能同“庙”，古汉语中的“家祠”与“家庙”是一个意思。

先人对国家概念的表述与今天不一样，他们把神州大地具体为五岳与四渎，五岳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雄峙四极。四渎是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称江河淮济。祭祀是一种仪式，充满了对岁月的庄严感，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古代帝王封禅、出巡、拜祭。明代把北京作为都城，设天坛以祭天，设地坛以祭地，设日坛以祭日，设月坛以祭月，设社稷坛以祭国，设先农坛以祭先农。

按《礼记》规制，祭祀是有层级的，“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那么地方“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各地就有了各地的坛。所谓“三公”“诸侯”指国家的重要辅臣，各个朝代有不同的指谓。《礼记》中的三公是：司马、司徒、司空，周礼的三公为：太傅、太师、太保，汉以后的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以山岳指代三公又有辅佐鼎力的寓意。

济南是府城，祭祀范围是地方的。天地坛是祭坛的统称，原址在泉城路珍珠泉对面，其前身是清朝的巡抚衙门，再往前推是明朝的德王府。据《历城县志》记载，天地坛是两座坛，始建于明代，一座是社稷坛，一座是山川坛。“社稷坛，德府前，坛西南向，祀国社稷。山川坛，德府前，东坛北向，祀境内山川，风雨旗纛、城隍诸神”，可以看出与《礼记》的规制相符。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军攻陷济南城，社稷坛和山川坛被毁灭，只留下两个名字。市民在两坛遗址上建坊开街，遂将两坛的名字合一，笼统地概括为天地坛街。

清济南府并非不行祭祀大典，而是将两坛移建到趵突泉南。《康熙济南府志》载：“社稷坛，在趵突泉南。祀以春、秋仲月上戊。”又：“风云雷雨山川坛，在趵突泉南，祀以春、秋仲月上戊。”两座相同名字、相同功能的坛，在不同的朝代出现在两处地方，只能说明是一次重建。“趵突泉南”的两座坛也拆除了，没有留下些许痕迹，济南的城建史在此处是一个断档。

济南的第三座坛是五龙坛。位置在城西门外东流水街。《康熙济南府志》载：“五龙

坛，在府城西门外，有龙潭在坛侧，岁旱祈雨于此。”可见，五龙坛者就是昔日的五龙坛。时光荏苒，名字替换，都是云龙所潜之地。然而，“坛”换成了“潭”，就把祭祀的功能去除了，当今的社会不再祈雨，也是社会发展的进步。

第四座坛是北坛。这是一座十分令人费解的坛。大凡坛，都是以功能命名，这座坛以方位命名，实为罕见。查《康熙济南府志》才明白，这座坛叫“郡厉坛”，“以城隍神位主之”，是祭祀孤魂野鬼的所在。对于这座坛的设立，当时给出一个颇为安抚民心的理由，“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国。各府、州县祭境内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祖先及里社土谷之神。上下之礼，各有等第，此事神之道如此。尚念冥冥之中无祀鬼神，昔为生民，未知何故而歿，其间有遭兵刃而横伤者，有死于水火盗贼者，有被人取财而逼死者，有被人强夺妻妾而死者，有遭刑祸而负屈死者，有天灾流行而疫死者，有因战斗而殒身者……此等鬼魂，或终于前代，或没于近世；或兵戈扰攘，流离他乡；或人烟断绝，久缺其祭祀，姓名泯灭于一时，祀典无闻而不载。此等孤魂，死无所依，精魄未散，结为阴灵，或依草附木，或作为妖怪，悲号于星月之下，呻吟于风雨之时。”按习俗，在国有国厉之祀，在郡有郡厉之祀，在县有县厉之祀，郡厉之祀在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这是一座寄托社会悲悯和哀思的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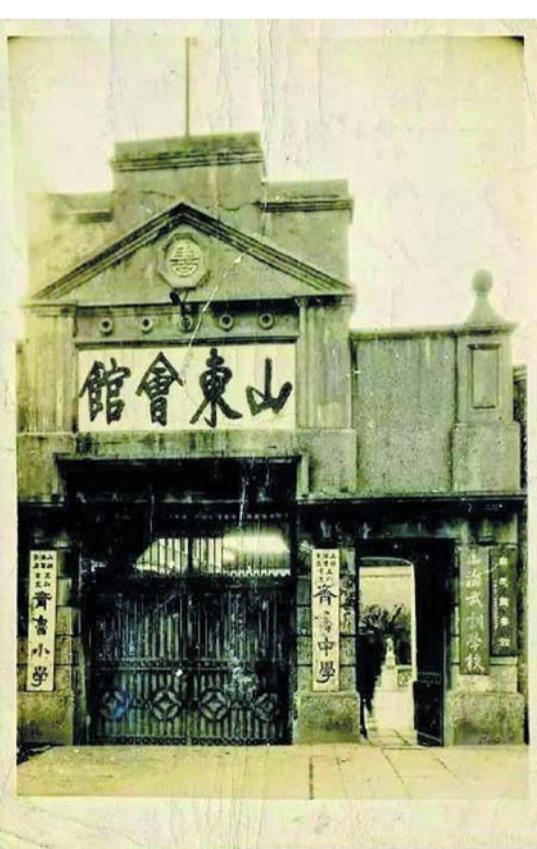
自有了人类活动就有了祭祀。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对祭祀文化有不同的理解和方式，其本质都是一样的。祭祀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礼记·祭法》说，“封土为坛，据地为坎”。是说堆成一个土堆即为坛；在地上挖个坑就是坎。“祭日于坛，祭月于坎。”坛和坎就是祭祀的社会舞台，每年都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生对历史的回顾，延续千年，便是我们的中华文化不能被割断的原因。

老子在《道德经》中给出了一个很中肯的解释，“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他是从思想道德层面讲祭祀和传承，说善于建立功业的人不虚妄，善于守德的人不会背弃道德，故子孙后代永世祭祀他。

社会在发展，文化日益从传统观念走向现代意识，祭祀概念被纪念概念取代。坛与坎也被纪念馆、纪念堂、纪念地、纪念碑代替，这不是一个个名词的更换，而是从理念到形式都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定位，天地日月祭祀被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取代。

在汉语言中，“坛”的概念和“祭”的概念仍然保留着，我们有国难日的公祭，有轩辕黄帝的公祭。古老的坛，无论是古迹遗存还是文化概念，都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脚印。

济南四坛



上海“山东会馆”存照，原山东会馆“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拍摄

投稿邮箱：
qlwbrwql@163.com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李皓冰 美编：颜莉